



世纪文库

哲学通信

[法] 伏尔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哲学通信

[法] 伏尔泰 著 高达观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通信/(法)伏尔泰(Voltaire)著;高达观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Lettres Philosophiques

ISBN 7-208-05444-4

I. 哲... II. ①伏...②高... III. 伏尔泰,
F.-M. A. (1694~1778)-哲学思想 IV. B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356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 著

高达观 徐仲年 王燕生 洪洁求 合译
宋紫裳 徐之海 蓝鸿春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174 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444-4/B·452

定价 22.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原出版者序

伏尔泰在上流社会中的烜赫一时和在朝廷中的飞黄腾达都因为德·罗昂事件*而在1726年突然被断送了。巴士底监狱，流亡，英国的热情接待（他在和波令布鲁克的亲密交往中，早已熟悉英国的情况），英语的学习，对哲学家（洛克，托兰德**……等人）、诗人（蒲柏）、小说家（柏特莱***、斯威夫特****）作品的阅读，对剧作家（莎士比亚、德莱顿……等人）作品的浏览和对这些作品演出的欣赏，对英国政治的初步认识，对各种宗教派别的约略考察，到处参观并受到种种招待，这一切再加上他敏锐地、深入地了解英国人对自己国家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一些意见，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从1726年到1730年酝酿和写作出来的，他回到法国以后才最后定稿。到了1734年，《哲学通信》才有法文版问世（英文版已在1733年出版）。我们知道这本书的遭遇：虽然高等法院的法官执行了1734年6月10日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本书被撕毁并烧掉了（判决书严斥这本书鼓吹信仰自由，对于宗教和社会秩序会引起极大的危害），但它还是多次秘密出版，并从1742年起，被收入伏尔泰的全集。这些信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永垂不朽；就是在今天，这本书还是为人们所最喜爱的和影响最大的伏尔泰许多著作之一，我不知道这些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由于作者显然年轻，还是由于他已开始成熟：这是一位35岁

* 伏尔泰曾在剧院中用傲慢的语气回答了贵族德·罗昂的话，德·罗昂怀恨在心，派仆人们当众杖责伏尔泰（1725年）。后来，伏尔泰又被送到巴士底狱监禁了一个月。1726年8月，被放逐到英国。（脚注均为译者注）

** 托兰德·约翰（1670—1722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起初从自然神论的观点批判宗教，后来转到了无神论的立场。

*** 柏特莱（1612—1680年），英国著名的作家，作品中讽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 斯威夫特（1667—1745年），英国著名的进步的讽刺作家。主要著作有《格列佛游记》等。

成年人的作品，他初次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从而使这部“哲学”纲领具有乐观主义和丰富多彩的特点。它的价值与其说是表现在内容方面（对于我们说来大部分是历史性的），还不如说表现在一个聪明人的语调和有启发性的知心话上面。

* * *

当我再次阅读这些通信的时候，最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它们的大胆，虽然这是很明显的；恰巧相反，而是它们能掌握分寸，并能保持一种平衡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来不粗暴地或毫无轻重地作出肯定。也许人们不太注意到伏尔泰对于不偏不倚的重视，说得更恰当一点，就是他对于辨别“优缺点”的重视，例如他认为：公谊会信徒是有德行的，富于理智的，但有些可笑；英国圣公会信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教权主义，但他们还有些道德品质；英国议会在世界上树立了政治自由与和平主义的典范，但有时免不了度量狭窄；英国的悲剧没有丝毫的高尚趣味，但它的情节起伏和创造精神却刺激了日渐消沉的法国戏剧界；即使是牛顿，伟大的牛顿，也有他的缺点和迷信。总之，如果有理由把这些《哲学通信》看作对法国的风俗和制度的一种讽刺的话，那也不要以为英国（伏尔泰对于英国善意的描绘往往为这种讽刺提供了资料）被渲染成好像《老实人》里面的爱尔多拉多*理想国一样：伏尔泰揭发了与大家有关的一些典型事物，对这些事物的显著缺点是从不放弃机会予以批评的。他的目标并非要将一个有缺点的文化来替代另一个可能有优点的文化；任何笼统的赞同是错误的。他要求他的同胞们或他所喜爱的东道主们要有这样的判断：毫无疑问，他们两国人民之间是有许多东西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的，既不要假害羞，也不要盲目地学时髦。所以，这种品德的精选、功过的辨识，给予伏尔泰一个他所喜爱的名词，也是他所努力使之通俗化的：那就是所谓“趣味”。这本“英国通信”**的第一课，就是讲趣味的一课。

* 富饶多金的理想国。

** 即本书《哲学通信》。

第二课，纯粹是“哲学的”部分，是实在主义和实验科学的一课：伏尔泰拿那位把物理学建立在精密的演绎法上的牛顿，跟那位把自己的天才浪费在空想学说的构成上的笛卡儿对立起来。他以那位“朴素地”写了灵魂的“历史”的洛克来代替那些形而上学者所编的“灵魂小说”。洛克是一个哲人，正如后来他在“无知的哲学家”一书里提到的那样：“他所不知道的绝不假装知道；实际上，他并不拥有无限丰富的知识，但是他的学问的根基却是很巩固的，而且他享受最可靠的财富而丝毫不夸张”。以上，毫无疑问，是伏尔泰思想的主要泉源，这种思想必然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不受欺骗，不受江湖术士的欺骗，不受辞令的欺骗，不受自己的欺骗。例如引力的原理，它说明了一直到那时还知道得不够清楚的宇宙现象；它反映了科学上一种毋庸争辩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引力”这个词就充分地解释了自然界的机制。引力是一个原因，我们常常可以证明它的结果，这并非只是只要一说就足以使我们深刻了解造物主的秘密的那种神秘的属性。真正的科学家是要及时地在漫长的链条上寻出几个重要的环节来，但是他必须很好地注意到不要把这种相对的知识和宇宙间绝对的智慧混淆起来，因为那种绝对的智慧是人类没有力量去获得的。

因此，伏尔泰的哲学是建立在人类知识的一种明显的相对论上的，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一自古相传的重要观点上看出伏尔泰的哲学和蒙旦涅*的哲学（或者和帕斯卡的哲学，帕斯卡对于这一论证是完全采取蒙旦涅的意见的）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不同之点表现在这种相对论的实际结果上；“英国通信”的特色就建立在这种实际的结果上；也就是由于实际的结果，“帕斯卡思想的批评”与“英国通信”是有密切联系的，前者有效地说明了后者。

* 米舍尔·德·蒙旦涅（1533—1592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进步哲学家。他在著名著作《经验论》（1580年）中怀疑宗教的教条。

蒙旦涅和帕斯卡都是孤独成性的人，他们在孤独之中考虑着人，反复沉思人的命运。如果说他们中间的一个安于反复沉思后的无知，那么另一个则向默默的启示要求彻底的解释。他们两人对于社会的看法很稀奇地获得一致：他们两人全都看不起社会，不相信社会是可以改善的，而是认为社会的那些不合理的缺点是我们天性中的必然现象。在这个人的怀疑论中和那个人的信仰中同样存在着一种保守的贵族主义，这种主义不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好的，或是庸俗的。这位哲人由于个人的人道主义修养而把人与人的关系忘掉了；那位宗教信徒在期待上帝的主宰时也把人与人的关系忘掉了。

相反，伏尔泰在相对论中则寻求一种行动的原则、一种社会组织的规律。对于我们的局限性的认识，在他看来首先是智力健全的最好保障。人是一种有限的生物，他的理解力的可能性和征服事物的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如果人确信这种说法，他便会给他的思想和行动划定相当正确的范围，从而和谐地实现他的命运。捉摸不定和变化多端的宗教教义就这样地在实际上终于达到自然神论或信仰自由。好好地理解我们的各种需要，利用合情合理的可能达到的幸福，就使我们肯定各种真正的“世间价值”：劳动、闲暇、繁荣。最后，这种实在主义哲学的因素，这种社会形式的新伊壁鸠鲁主义的希望（而且也可以说是信念），对还处在麻痹状态的人类来说，是一点逐步发展的光明，也就是一种代表人类所能要求的高级意识和高度精炼的世界主义“文人共和国”的巩固。这些就是“英国通信”的主题。

从这最初七封信中所表达的自然神论，乃是对特殊宗教中好勇斗狠的信徒们的“狂热”和狂信的反抗。在伏尔泰所仔细考察过的英国不同的宗教派别里，对有一些派别，如公谊会和苏西尼主义，他是以同情的态度研究的；对另一些派别，如英国的圣公会和长老会，他就或多或少地加以批评或批判了；只有公谊会和苏西尼主义后来还使他感到兴趣。原因是长老会和英国圣公会互相间都有像伏尔泰所指出的加尔文主义者和天主教信徒的同样错误，如学院式的迷信，或教权主义和世俗

的野心等；当他们交手的时候，伏尔泰把他们比作虎与熊斗。相反，公谊会信徒却吸引了他；他对于这派信徒确是有一点偏爱的。后来，他在一种情感激动的情况下说道：“我爱公谊会信徒……”。但是这些怪人们很容易使他扫兴，例如他们那种含有挑拨性的简单粗率的习惯，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和装作痉挛的动作，以及他们的反对演戏！但是有一种主要的品质使他们在他们眼里又恢复荣誉，这就是他们的宗教完全是精神的。他们认为，基督的洗礼真正是“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洗礼”。由于这种哲学的纯洁，使他们爱道德更甚于爱神学。他们能够想象出一种哲人的社会来，例如那个饶有诗境的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差不多全体人民都只爱着上帝和人类”。

至于说到苏西尼主义者，伏尔泰对他们的描绘，凭着直接观察似乎比凭着热忱的想象要少得多。在英国，无疑还可能遗留下若干看到过苏西尼主义者异端的人；但是伏尔泰自己也承认这些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流派的团体。为什么从那时起就把苏西尼主义者称做朴素的自然神论者呢？而在这类自然神论者看来，基督教本来完全是没有启示的教义的。这就是因为伏尔泰要把他的自然神论联系到一种传统：比苏西尼主义更进一步出现的是反对圣三位一体的一切异端，以及在最初时期，就是阿里乌主义和圣亚他纳修的有力对头。

“阿里乌宗派，在出了三百年风头之后又被人们遗忘了十二个世纪，最后终于死灰复燃起来……”^{*}既然基督教曾经长期地在圣亚他纳修和阿里乌之间摇摆不定，为什么它不仍然摇摆呢？为什么它不归真返璞采取一种更朴素、更合理，因而也更宽大的教义呢？自从《哲学通信》发表以后，就形成了这位未来的年德俱尊的长者的伟大幻想：把哲学和开明的宗教^[1]联合起来，使那些自由的基督信徒承认，并且给他们描绘出那已经在全世界发展起来的一种可尊敬的有

^{*} 阿里乌在 318 年左右就宣传阿里乌主义，反对圣三位一体说，当时得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和国王们的支持；到 325 年在尼西亚召开的宗教评议会上，圣亚他纳修却极力反对阿里乌主义。因此，基督教曾长期在圣亚他纳修与阿里乌之间摇摆不定。

神论的美好远景来鼓励他们。最后，他还草拟出一个道德高尚而平静的萨朗特*那样的梦境，好像公谊会的宾夕法尼亚或洛克的加洛琳一样。以后，他就带着这个纲要在1755年到“乐园别墅”安居下来，这时倒比在1730年^[2]更有信心，更热情了。在宗教领域上，《哲学通信》确是含有战斗的伏尔泰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

* * *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这些信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上、学说上的形式而已，它们肯定了社会纲领的条款和人间真正价值的等级。由这一问题到另一问题的过程是借助于反教权主义而形成的，而我所谓反教权主义是最广义的意思：这就是说，不要让舆论或信仰去操纵人类社会；这种人类社会只需要一种物质的平衡，而在作过需要和资源的客观研究之后，社会就能在健全的管理中获得这种平衡。要是学说和教义干涉的话，马上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不协调、争吵和内战；一旦观念发生作用，人们就会抛开实际而去捕风捉影了。所以特别需要从宗教中把所有的政治权力排除出去；英国圣公会信徒也像天主教徒一样，想要拥有这种政权，结果，反而发生了最坏的事变。社会和平首先应该是非圣职人员的信徒的。

如此说来，伏尔泰像是在需要推荐的政治理想上有所徘徊了（第八—第十封信），而人们如果停留在他的某些细枝末节的论点，上，也就会时常弄错。正因为常常是这样，当我们想要看清楚他的分析的思想时，我们必须对照各种不同的原文，把它们按照其范围和产生的情况来分类。我们便会看出他有一种常备的而区别细致的评价尺度，在这个尺度中，每种判断都有恰当的位置。他觉得专制的和极权的制度比之封建制度更好，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经济统一的秩序和情况能够得到保障，而且教权主义还可受到政权的控制；但是这种制度的缺点是专断，时常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在这一制度上，建立起市民和商人的共和

* 意大利的古城（又名大希腊），是芬乃龙寄以幻想的城名。

国，其中的公民特别期望自己对国家有所贡献：他们的自由而健康的活动景象是一位哲学家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事物之一。^[3]这就是一种可贵的政治评价尺度，而且它还有能适应历史进化本身的优点。此外，还有一种道德和理智的评价尺度来配合并补充它：在这个尺度的底层，我们可以发现形而上学和尚武精神，它们的乌烟瘴气迷昏了并且激发了骄傲的精神；再高一层，就是艺术和技巧，它们并不要求“大智慧”，它们却适合于全体人民，并使人民勤劳过活；至于英才，他们是具有以和平的哲学与丰富的智慧所形成的正直，而正直又是具有足以破除迷信，足以逐步启发一切肯接受启发的人们的热情。

这一种评价尺度，把人们同意称作丰功伟绩和伟大理想的都降到次要地位，而非常重视文化的各个不同的面貌：平凡的技艺创造，科学家的发明，文学的高贵造诣；这一切的总和都是用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和提供丰富而柔软的、适合我们消化能力的食粮，用以代替那些没有营养的食粮。于是伟大的名字就不再是那些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名字了。“不久以前，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帖木儿，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说：这一定是伊萨克·牛顿。”（第十二封信）这里有一种新史学原则，对于有益的事物、经久的作品、文明，要比战役、朝代争论和宫廷事变更重视，这就是《路易十四的时代》，特别是《风俗论》的公式；我们可以注意，在这一点上，《哲学通信》比《查理十二世史》要更进一步；虽然这部《查理十二世史》与《哲学通信》是同时期的，但是前者只叙述了一位英雄的功勋。

* * *

我们现在可以明了为什么第十一封信讨论“种痘”，为什么第十二到第十七封信赞扬英国的三位曾经奠定了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基础的伟人：培根、洛克、牛顿；为什么以后的几封信详论一个不大为法国人所知道的、富有诗意美的国度。这都是一种比较大胆和比较自由的精神的明证，也说明了为什么伏尔泰在二十四封正式的英国通信上又加上

“对帕斯卡的批评”：所有这些，细节可能是多种多样，用意却相同，就是让人们有自信心，给他们指出在失望、彼此不睦，或是向绝对的神秘和满心虚荣的专断让步之前，他们在其能力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好事可做：把他们的生活组织得舒舒服服，互相了解，互相原谅，与其追求一种不可及的真理，宁可追求一种美，或是更确切一点说，追求一种趣味，由于这种趣味，人类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微妙和良知的顶峰。

有两封信：第二十封“谈研究文学的老爷们”和第二十三封“谈人们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乍一看可能认为是离开了主题。这两封信的出现，这里要说明一下。英国人在家里把蒲柏的肖像悬挂在首相的肖像的旁边，给牛顿送殡就像给亲王送殡一样，把伟人的陵墓像国王的陵墓一样安置在威斯敏斯特内。他们对于他们的作家和科学家的尊敬，是有助于智慧的发展的。在英国，王公贵族都不以写作为耻，他们为自己统治下的国人效力或取悦于他们的国人；至于职业作家，他们有时也担任国家最高的职务。贵族、政治和文学的这种混合，特别吸引了伏尔泰，他以为这是自由与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并且还觉得这里有一种独特的民主气氛，这在他的祖国是相当稀罕的，所以值得提起“在伦敦约有八百人有权公开讲话维护民族利益。约有五六千人热望着也轮到他们享有这种荣誉。其余的人们都以这些人的裁判者自居；而每人都可以用书面发表他对于国家事务的意见；所以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

这种开明的民主，这种由自由主义的、有理智的贵族阶级所缓和的民主，也许是在他乐观的时候所梦想过的制度。总而言之，他从这种梦想里曾经引起一种想扮演一员政治或外交角色的雄心。到了1753年以后，这种雄心完全幻灭了。接着他又想把哲学的和自然神论者的英才组织起来，最后便只乐于做那个“在欧洲不顾战争不问宗教差别而组织起来的‘文人共和国’”、那个“到处分布又到处独立自主的伟大的英才社会”（《路易十四的时代》）的主持者。这些雄心、这些欢乐、这些梦想都已经包括在“英国通信”里面了，也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这些通信

的统一性和深刻的兴趣。这些通信不仅是些研究外国的资料，也不仅是些关于世界主义的宝贵的证据，还给我们介绍了完全武装起来的伏尔泰，明显地确定了他的毕生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解放全人类，解除全人类和他们的命运之间的矛盾。

* * *

在居斯达夫·郎松用极其令人敬佩的精确性刊行了评注版以后，^[4]我只能采用经过他选择和校勘的原文，即儒尔版的原文，这一定是1734年伏尔泰同意的最初的原文了。可是我在这个版本中采用了现行的缀字法，并也常常采用现行的标点法（除非伏尔泰那样标点别有用意），而并非单纯地按照一种现今已不存在的习惯。实际上，我认为在一种通行版本里，用不着保持那些古代写法或错误，伏尔泰是爱好“现代”的人，这种兴趣必然会毫无怜惜地删去那些错误；倘使要认识原文的真面目，我们尽可参考郎松的版本。我只作了一个惟一的例外，就是使用大写字母；18世纪的缀字法把大写字母用在相当多的普通名词，例如职位的头衔、集合名词、习用抽象名词上面，后来我们就平写了；我觉得保留这种传统是无害的，它不致使文字变得真正古老，却在无形中带来了古代体制一定的典雅风韵。

从居斯达夫·郎松在一直延续到1784年（开勒版）的一切版本中所摘录的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原文中，我选择了那些最富于表现力、能使读者窥见伏尔泰思想发展的原文，特别显著的是在1750年以后；但是除去少数例外，我只保留了直到开勒版为止的原文，实际上也就是经伯休版直到莫郎版以前的原文。我通常把这个最后的版本称为《哲学通信》的通行本。但是作品一旦用这部分最低限度的材料发表，我想读者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可能要求其他的资料。原文的分歧不只限于它的不同版本，特别是像伏尔泰这样一位作家，他屡次在同一个箭筒里取箭，*必须从一部著作到另一部著作比较他的思想的各种形式。拉·

* 箭是指讽刺文章，此句指就一个主题作出许多文章。

布律耶有一个意见在这里倒是最有益的：为了不持偏见也不轻率地认识一位作者，首先必须注意“使作者本人的意见一致”。所以我们在注解里可以找到关于在“英国通信”里所讨论的各种不同问题的最有参考价值的对照材料；这些原文，写作时期不同，是从伏尔泰著作中几部主要作品《路易十四的时代》、《风俗论》、《哲学辞典》、《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和若干其他次要资料中摘录出来的。〔5〕

读者如注意一下在“英国通信”发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开始讨论的一些哲学主题的命运，就可以渐渐看出在若干问题上，有一个统一性指导着从1734年到1775年伏尔泰的宣传工作；就可以看出在一封“英国通信”，一章“风俗论”，一条“哲学辞典”，甚至一页“高乃依评述”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伏尔泰从很早就构成了一种万能方法，我们发觉他坚持使用这种方法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并非是他自己抄袭自己，他显然是出口成章，即或是在他偶尔重复他自己的话的时候。他的方法很容易比做一位优良教授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方法：这位教授根据一种已经掌握的教材创造一种生动的形式。对于这位教授来说，主要的不是尽量更新教材（虽然他可以作许多细节的补充来丰富教材），而是在每次表达这种教材时要有信心，而且表达得生动。他有时也可能重复同样的语句，但是他更时常重新创造这种语句的形成，而且，总而言之，重复的话也不令人觉得讨厌，因为这些话重新又获得了生命。伏尔泰便是这样，他的方法有极好的教学法性质。他很知道他是在重复前面讲过的话。他声明说：“我在初期教会一文中已经谈过公谊会，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还想再谈一谈。”这是可敬佩的谆谆善诱的热忱，说得露骨一些，就是布道。第十二封和第十四封信的某些片断在第十五封的开端几乎又完全重述一遍。我们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里也找得到这样的片断。无关紧要！这类反复论述每次都是切合实际的，而且都是真实的。伏尔泰不是在那儿写文章，而是在那儿谈天，没有人想要责备他的一些疏忽之处，因为这些疏忽恰恰是他的忏悔，是他的老实话。

这一点也是使人几乎不可能把他的全集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原

因。他的作品没有一本是不与其他作品密切联系的，其中有许多部分都是共同的。而每种单独发行的版本实际上都是从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割裂下来的，这个活生生的肉体又是以各种不同的主题和各种不同的时期为经络而组成的。保持文学的真实性的最好办法或许便是选取每件作品连同它那些天然分枝，而使读者读过原文之后，再读一些与原文显然有连带关系的断简零篇，然后再读这些片断出处的原书。这就是我在这里所尝试的，相信这种通过伏尔泰著作的有指导的巡礼，正像伏尔泰提到他访问公谊会信徒时所说的一样，值得引起“一个有理性的人的好奇心”。

莱蒙·那芙*

注 释：

[1] 洛克在这里显得像苏西尼主义者，牛顿也差不多如此（至少在 1756 年的一种版本上是这样）。

[2] 参看 1756 年的修订本第七封信的末尾。1756 年对于“英国通信”中的种种修改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请注意自从到达日内瓦以后，苏西尼主义的观点又出现了（再参看达兰贝尔《百科全书》的“日内瓦”条目）。

[3] 请看第十封信“谈商业”和第十封信注[5]，在这一段注解里有一段《风俗论》的原文：伏尔泰在其中赞扬荷兰是一个具有幸福生活的、舒适而和平的国家。

[4] 近代法文善本鉴定会，笃罗兹书坊。

[5]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在从 1734 年到 1742 年间出版的关于帕斯卡的“批评”上又补充了 1776 年发表的“最后的批评”，这些批评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材料，比一切阐述更能指出一种经常是坚决而明晰的思想的连贯性来。

* 莱蒙·那芙是法国都罗斯大学文学院的讲师。